

红色陕北

/下卷/

历史见证了西北红军用生命和鲜血浇铸的
这块红色土地，对于中国革命有着不可低估的
历史作用。



李建雄 著

史诗性历史纪实作品
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始末的详尽解读

HONGSE SHANBEI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013063618

I25
1010
V2

/I·世/

红色陕北

李建雄 著

1919-1937



北航

C1671922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I25

1010

V2

SHANGAN
HONGJUN

第七部 ★
陕甘红军



第四十三章

三嘉塬改编

谢子长受命赴南梁

两支游击队会师后，刘志丹旋即派人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部队的整编和今后行动问题。在等待省委指示的期间，两支游击队暂驻南梁、林锦庙一带，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土匪，救济群众，积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这时，谢子长、李光明受中共陕北特委派遣正在甘肃平凉了解刘志丹离开后陈珪璋部队里党的兵运工作情况。

刘志丹从合水脱险后，陈珪璋部平凉教导团发生了杀害政治教官刘耀西的事件。这一事件引起打入陈珪璋部许多共产党员的再度恐慌，不少共产党员先后离开陈珪璋部。

刘耀西，陕西葭县人，生于1904年。1924年秋考入绥德四师。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毕业后到内蒙古大汗太吉部队当兵，再转神府高志清部。1930年，由中共陕北特委派往宁夏苏雨生部，在谢子长的新编第十一旅开展兵运活动。苏雨生平凉兵败后，刘耀西与谢子长、刘志丹失去联系，通过关系先打入驻平凉的陈珪璋部，担任该部教导团的政治教官，并以此合法身份作掩护，在教导团秘密成立了中共军团委，担任军团委书记。

刘志丹在中共陕北特委工作时就与刘耀西十分熟悉。刘志丹在陈珪璋部组建第十一旅期间，刘耀西利用教导团政治教官的身份为刘志丹尽快拉起队伍的事情忙碌地往返于宁县和平凉。贺晋年、史法秩等在苏雨生兵败平凉后，

先到定西县,后得知刘耀西在陈珪璋部,又从定西县到该教导团,与刘耀西及同为教导团政治教官的傅宝珊在陈珪璋部开展兵运。刘耀西事件起因是他一次给士兵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人告密。陈珪璋派人搜查时,从刘耀西的身上又搜到一份中共秘密文件,即将其逮捕下狱。刘耀西的身份暴露后,傅宝珊、贺晋年、史法秩等许多共产党员离开教导团。贺晋年前往靖远,史法秩返回陕北。

刘耀西被关入监狱后,陈珪璋先以利诱,后施酷刑,企图从刘耀西的嘴里获得共产党打入该部的全部活动情况。刘耀西守口如瓶,宁死不屈,最后被杀害,用生命换来了陈珪璋部的全体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的安全。



张秀山

谢子长、李光明到平凉时,陈珪璋对原第十一旅已进行了改编。第十一旅的张秀山、王世泰、张文元、杨植本、杨彦麟、魏长顺、王廷光、常佩青、马福吉等18名共产党员均被编入刘保堂部队的第一营,除张秀山在营里任排长外,其他共产党员都是士兵,但他们的活动仍十分活跃。

张秀山、王世泰等在部队里建立了中共支部,张秀山任支部书记,王世泰、曹化民(一营营部书记官)为委员。他们在第一营利用体育活动、教士兵唱歌、教士兵学文化、帮写家信、记口令等方式,广泛联络,与非党的班长、副班长交朋友拜把子,不到两三个月工夫,第一营的三个连里就新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兴起抗日高潮,谢子长指示张秀山、王世泰、曹化民等在刘保堂部队中要隐蔽好,继续秘密开展兵运活动,积蓄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同时指出当前的任务是要在陈珪璋军阀部队里加强抗日宣传。

这时,原留在刘保堂部队的白冠五、刘景范已离开平凉,到保安找刘志丹去了。

不久,谢子长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受命调往南梁,领导陕北游击队

和南梁游击队的整编事宜。临行前,谢子长留下李光明协助张秀山、王世泰、曹化民等在刘保堂第一营开展兵运活动。

暂归陈珪璋

1931年11月上旬,谢子长离开平凉,在赶往南梁的途中,先后遇见高岗、马云泽。高岗也是由中共陕西省委派到南梁协助谢子长整编陕北、南梁两支游击队的。

谢子长一到南梁,首先把陕北游击队中的原土客队伍作为整顿的重点,又派出共产党员雷恩钧、陈玉清等到师储杰部担任指导员,以加强政治工作。陕北、南梁两支游击队整编后,中共陕西省委没给番号,也没设总指挥机构,只成立了新的游击队队委会。根据省委的任命,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胡廷俊、白锡龄等为委员。

在谢子长主持下,召开了新的队委扩大会议。在讨论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和今后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时,大家一致认为:阎红彦在近一年的晋西、陕北游击战争中,坚决果断,勇敢机智,显示出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但在艰苦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工作方法简单粗糙,缺乏民主作风。决定由阎红彦带12名战士,另行组织一支游击队,到桥山北段开展游击活动。

庆阳、环县、三边一带,是甘肃、陕西、宁夏三省交界半农半牧地区,土地、牛羊多为地主豪绅所有,劳苦大众受尽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盘剥,生活十分困苦。阎红彦领导的游击队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抗捐、抗款、抗粮,群众逐渐认识到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人闹翻身的队伍,便主动给游击队带路,报告敌情,有不少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00多人,尤其扩大了骑兵,增强了战斗力。

这时已是冬天。南梁一下聚集800多人的部队,除吃饭外,保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寒冷的天气里,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此时,陇东的军阀陈珪璋为壮大自己的势力,派人前来商谈对游击队的收编。为解决冬天部队的给养,谢子长、刘志丹派出马云泽、刘约三到平凉,与陈珪璋商谈部队改编事宜。

马云泽、刘约三到平凉后,正好杜斌丞也在那里,二人遂去拜访。见面后,刘保堂向杜斌丞介绍马云泽,杜斌丞摆摆手说:“我认识,不要介绍。”

杜斌丞早在1927年秋就认识了马云泽。那时,马云泽、张慕时、崔仲英等几个共产党员在冯玉祥部,正遇冯玉祥在郑州“清党”,无法立足,决定返回陕北到榆林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井岳秀的第九路军中开展工作。准备动身时,得悉杜斌丞住在洛阳,他们几人虽不是榆林中学的学生,但对杜斌丞关心、爱护青年学生的事迹早有耳闻,便去找杜斌丞帮忙。马云泽等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店找到杜斌丞后,杜斌丞问明原委,表示愿意举荐,但叮嘱他们返回陕北后要格外小心,井岳秀和冯玉祥都是军阀,井岳秀“清党”的真面目也会暴露出来的。他们回到陕北,有四人到井岳秀第九路军政治处工作。1929年4月,马云泽脱离井岳秀部,随谢子长到地方组织武装斗争。

1931年2月间,谢子长派马云泽到西安去见杜斌丞和呼延立人(与谢子长同学,时任杨部参谋处长),准备通过他们的关系向杨虎城要一个合法的军队番号,以便开展兵运工作。杜斌丞说:“你们的工作情况我清楚,打算很好,要个番号也可以勉强办到。不过你们以后要另打旗帜,我和杨虎城是朋友关系,那时就不好说了。”并建议说:“还是你们自己动手干起来再说。”

马云泽离开西安前,正与艾德生、杜理丞一起交谈,军法处的便衣队以“涉嫌在商洛勾结土匪”的罪名将艾德生抓捕,连同马云泽、杜理丞一并抓走。杜斌丞得知后,亲笔写出证明信:“马云泽是我的乡亲,到西安找工作的。我可以证明他是个好人。”马云泽被保释后,杜斌丞又给盘缠路费,使他安全离开西安。

杜斌丞听说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北、南梁两支游击队合兵一处,已有800多人的队伍,即大加鼓励,赠给马云泽一支手枪,并促使收编谈判顺利完成。陈珪璋派刘保堂等前往南梁负责部队的改编。部队仍沿用原刘志丹在陈珪璋部时第十一旅的番号,谢子长为旅长,刘志丹为副旅长,杨重远为参谋主任,杨琪为副官处长。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团,师储杰任团长,供给主任马云泽,下辖四个营,一营营长阎红彦,二营营长吴岱峰,三营营长雷恩钧,四营营长白锡龄;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刘志丹兼任团长,下辖四个营,一营营长赵二娃,二营营长杨培盛,三营营长唐青山,四营营长贾生财。

当得知谢子长、刘志丹组建的游击队子弹匮乏、无越冬棉衣的困难情况后,杜斌丞立即把他准备送给石子俊旅的几箱冲锋枪子弹和手枪子弹交给马云泽、刘约三带去,并促成陈珪璋给游击队发了一批棉衣和军饷,解了燃眉之

急。刘保堂也筹到200块银洋,交给马云泽、刘约三,表示对游击队的支持。

刘保堂到南梁后,为了同心合力拧成一股绳,与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刘约三、马云泽、胡廷俊、雷恩钧、白锡龄、陈玉清、师储杰、杨琪、杨培盛、赵二娃、唐青山等18人举行拜把子香堂会,表达志同道合的革命心愿和意志,由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我等弟兄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如有中途背叛等情,天诛地灭。”这是谢子长、刘志丹利用民间习俗团结同志的一种政治策略。刘保堂要求跟着谢子长、刘志丹一起干,他说:“你们都是大人物,跟着你们干一定会有出息。”

刘志丹认为刘保堂原是陈珪璋部的军官,利用公开身份,有利于开展兵运工作,便劝说道:“你现在用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对革命事业更有好处,待时机成熟就可以过来。”

刘保堂接受了刘志丹的意见,后受谢子长、刘志丹的派遣离开南梁,打入西北军阀队伍,秘密进行兵运工作。1941年因身份暴露被张廷芝活埋。

陈珪璋表面对收编这两支游击队大为高兴,其实企图将这两支游击队吃掉。谢子长、刘志丹、高岗对此早有防范。

不久,果不出所料,陈珪璋秘密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兵分三路,亲自挂帅,偷偷朝第十一旅的驻地包围过来,企图一举歼灭陕北、南梁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立即率领两支游击队在柳林村对陈珪璋部发起袭击,攻其不备,歼灭了陈珪璋部的两个营,大获全胜。

柳林村一战后,谢子长、刘志丹旋即率领两支游击队离开陈珪璋的防区,开拔到正宁县北柴桥子休整。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

1931年11月,杨虎城派出孙蔚如师入甘讨伐雷中田。陈珪璋部与杨虎城部孙蔚如师第四十九旅(旅长杨子恒)组成联军北上。

12月1日,联军攻克兰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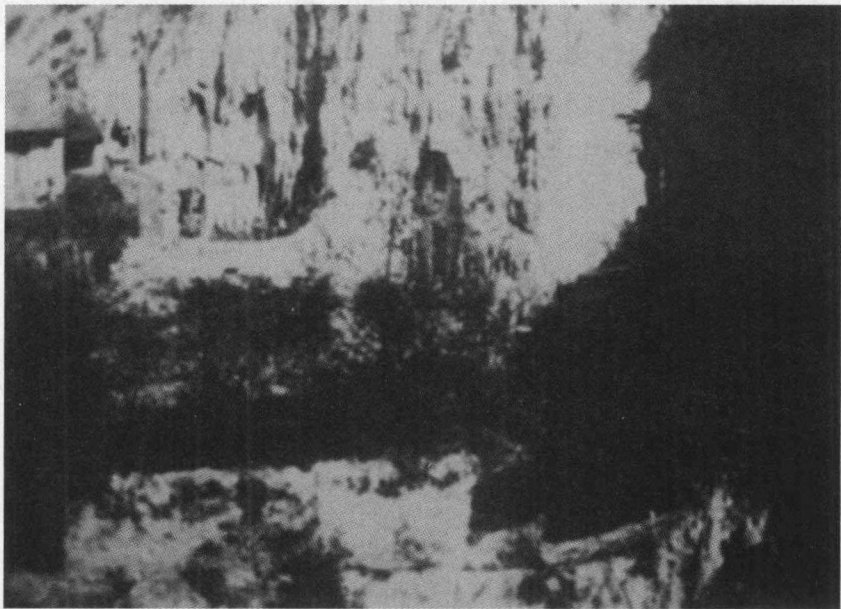
1932年2月,杨子恒部下将陈珪璋杀害。随之,孙蔚如对陈珪璋部在兰州、平凉、泾川各处的驻军发动进攻,将陈所部全部收编。

在进攻平凉时,张秀山、王世泰、曹化民等共产党员正试图从第二团起义

拉出一支武装,但由于战斗发生突然,起义准备工作又不充分,致计划流产。

在攻打平凉的战斗中,王世泰与十几名共产党员被俘,编入孙蔚如部一个机枪连当了兵。王世泰在机枪连瞅上了四挺重机枪,准备在部队与谢子长、刘志丹的红军游击队交战时,与其他共产党员发动火线起义,将这四挺重机枪拉到游击队。结果王世泰由于身份暴露,只得孤身离开孙蔚如部队。其间,张秀山脱离孙蔚如部队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平凉再次起义失败的情况。省委认为张秀山过去曾在王子元的部队,有组织策划该部起义的条件,决定派他再打入王子元部开展兵运工作。

这时,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在短短三个月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3000万东北同胞成了亡国奴。日本得寸进尺,向内地发动了进攻。



三嘉塬锦章村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旧址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在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上海总工会根据党的指示发布了总同盟罢工命令,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全力以赴与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经激战两昼夜,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为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到甘肃正宁县,传达省委指示,决定将陕北、南梁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简称反帝同盟军)。

1月底,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陕北、南梁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召开军人大会,由荣子卿代表中共陕西省委正式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杨琪任副官长,强龙光任骑兵队长。同时,成立了反帝同盟军党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等任委员。

陕北、南梁游击队原两个团改编为两个支队,由师储杰任第一支队司令,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一大队队长阎红彦,二大队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三大队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陈玉清,警卫队队长白锡龄;由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司令,朱侠夫(一说朱理凯)为参谋长,马锡五为军需官,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一大队队长赵二娃、副大队长刘景范,二大队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五,三大队队长唐青山、副大队长谷聚山,警卫队队长贾生财。

突起的枪声

反帝同盟军成立几天后,在合水县歼灭国民党暂编第十三师两个连。随后部队经南梁到子午岭,又向正宁县三嘉塬一带转移。当时,部队给养、弹药十分紧张,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地主以解决供给是常有的事。在部队路经任家堡时,遇到了地方反动土豪武装的抵抗。

任家堡的土豪武装只有十多支枪。当地老百姓不了解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队伍,一听说有队伍来了,便都聚集到堡子里。在堡子里的老百姓由于受土豪的蒙骗都协助土豪武装一起从堡子里扔出砖头、石块,袭击游击队。

这时,第二支队赵二娃所带的一大队还未等部队领导命令,就已经一窝蜂地攻打起来,并很快将堡子打下。队伍一冲进堡子,由于部队组建时间不长,内部成分复杂,纪律松弛,鱼目混珠,即在堡子里开始打、砸、抢,把堡子里弄得一片狼藉,还把受蒙骗的老百姓打死打伤不少。尤其是赵二娃还带人抢了老百姓的牲口和财产。群众纷纷找到谢子长告赵二娃等人的状。

为了挽回游击队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部队开到三嘉塬,谢子长立即召开有关积极分子会议进行动员,下决心对队伍进行整顿;决定“清洗部队不纯分子”,解决赵二娃问题。谢子长在会上说:“我们这个部队纪律很坏,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用不了几天就会失败。”刘志丹同意整顿部队,但提出从缓教育。

谢子长认为,刘志丹是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司令,在其支队属下的赵二娃所带队伍如此作为,刘志丹有直接领导责任,并且顾及赵二娃原是刘志丹南梁游击队带过来的人,担心刘志丹会袒护,所以在研究处理赵二娃的问题时,一直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刘志丹对荣子卿、李杰夫、谢子长的处置意图一无所知。

2月6日,谢子长命令部队全体集合。谢子长、刘志丹都腰插短枪,站在一个高土台子上,谢子长首先向部队讲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人民子弟兵,我们为人民打天下。要革命,就不能不要纪律。”

接着,谢子长果断地发出命令:“现在,下赵二娃的枪!”

赵二娃不服刚要反抗,谢子长预先在赵二娃的身后布置了阎红彦、白锡龄两人,一人抱住赵二娃的双臂,一人举枪将他打倒在地上。与赵二娃一起在堡子里违犯了纪律的人,一听说要缴他们的枪,吓得丢下一二十支枪拔腿就跑。第二支队三大队的谷聚山、一个姓王的中队长和战士周毛牛见势不妙,慌忙准备跑走,荣子卿命执法队立即将三人当场开枪打死,才使混乱将起的部队恢复了秩序。

谢子长命令执法队当即缴了刘志丹的枪,第二支队的武器全部被收缴,并宣布解散二支队,限定当日离开部队。

第一支队司令师储杰一看游击队的军纪如此严明,自己恶习一身,说不定哪一天犯了毛病,也会跟赵二娃和谷聚山等的结局一样,当场吓得直冒冷汗。师储杰所部人人自危。于是,当天夜里(一说是第三天)师储杰拉走近200人的队伍,偷偷离开反帝同盟军,投奔杨虎城部去了,使得游击队蒙受极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深明大义,沉着冷静,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毅然维护了部队在关键时刻的稳定。对“三嘉塬事件”,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一直有着争论,直到1986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对这一历

史问题作出结论：“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刘、谢两位主要领导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多数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刘志丹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在“三嘉塬事件”中，白冠五也负了伤，后被朱侠夫护送到西安治疗。在白冠五临行前，刘志丹语重心长地说：“到了西安如有条件，你就作长期潜伏的打算。革命工作需要隐蔽于敌人内部的无名英雄。在那个环境里，你将要单人独马战斗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这比对付苏雨生、陈珪璋、高广仁要复杂得多。这个任务是我安排的，由我负责，你要发挥聪明才智，去适应一个全新的战斗环境。”白冠五伤愈后在国民党省警察局供职，1936年刘志丹牺牲后，即与中共组织失去关系。

被谢子长勒令离开反帝同盟军的马锡五、刘景范等人，从三嘉塬走到旬阳县职田镇时，正好碰上高岗。高岗是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正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从西安返回反帝同盟军指挥部。马锡五、刘景范见到高岗，就“三嘉塬事件”给高岗作了汇报。

高岗得知此事件引发的严重事态和游击队面临的困境时，不敢懈怠片刻，快速赶回部队，将刘志丹的枪交还本人，并协助谢子长、刘志丹整顿和收归了一部分离开部队的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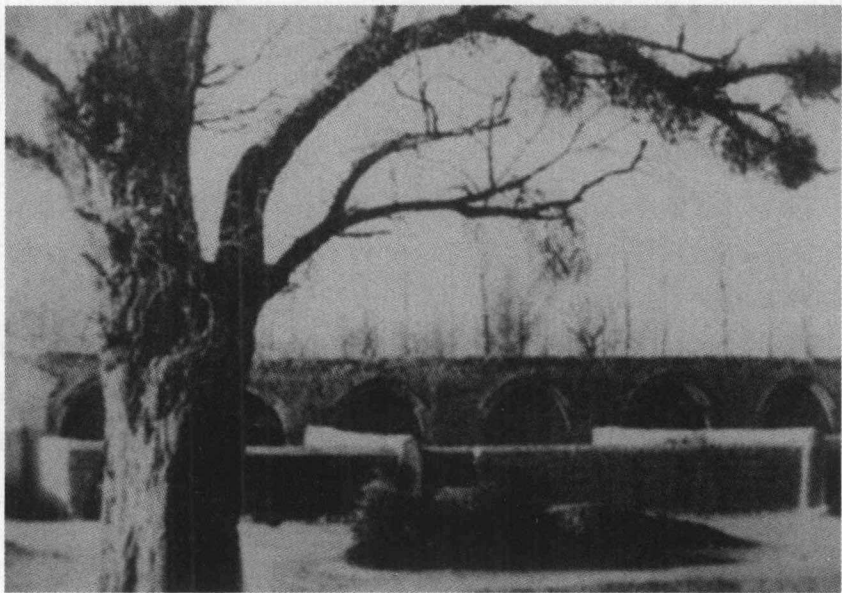
马锡五回忆说：刘志丹开始闹革命，初建革命武装，是经过一定的锻炼考验后再提升为工农红军，对收编的土匪，先编为义勇军，经教育改造后才编入红军。部队当时的纪律十分严明，“有的同志如有了钱，就考察他钱是哪里来的，贪污20块就枪决，贪污10块开除党籍，贪污5块开除军籍”。

成立陕甘游击队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要部队尽快公开打出红旗，将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要求部队改编后向渭北平原进军，在西安附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威胁西安。

当时,反帝同盟军的领导人对部队改编没有意见,但对省委决定要这支刚诞生的红军部队向平原地区进军分歧很大。由于反帝同盟军的领导人迟迟没有动静,中共陕西省委又派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到部队监督执行省委对反帝同盟军的改编指示。

1932年2月12日,反帝同盟军指挥部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村将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在成立大会上,高岗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建立陕甘游击队的指示。由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了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和编制,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下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第三大队队长雷恩钧,警卫队队长白锡龄。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李杰夫、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等20多人为委员。谢子长在大会上讲了话。游击队成立后,刘志丹即到西安向省委汇报游击队的改编情况。



1932年2月12日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旧址

在成立陕甘游击队的这一天,近千红军战士整齐地排列在细嘴子村的旷地里,一眼望去红旗招展,刺刀、红缨枪闪闪发光,每个红军战士脖子上系着红领带,战马头上挽着红绸子,昂扬的战歌和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显得威武

雄壮。正宁、旬邑一带的农民群众成群结队，有的抬着猪羊，有的吹着唢呐，从四面八方赶来庆贺。

当中共旬邑县委第五伯昌代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把一面缀有镰刀斧头标志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字样的红旗授给谢子长时，只见谢子长高举红旗，当空一展，群情更加激昂，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人们仰望着这第一面在陕甘高原上兴起的飘扬着的革命红旗，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到莫大的兴奋和鼓舞。这次部队的改编，标志着西北革命的发展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第四十四章

红旗插上旬邑城

阳坡头战斗

陕甘游击队成立的第二天,部队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即离开正宁县的三嘉塬细嘴子村,决定南下,出兵攻打旬邑县的职田镇。

1932年2月13日夜,陕甘游击队主动出击,摸进职田镇。杨琪带着一支骑兵队,抓捕了国民党区公所区长、民团团总和不少土豪,并歼灭了镇上民团。

待天亮后,由警卫队押着国民党区公所区长、民团团总以及土豪游街,发动群众,开仓放粮。镇上成立的农民协会组织群众焚烧了区公所的文书、账簿、地主的契约,熊熊火焰高蹿天空,穷苦百姓扬眉吐气,奔走相告。

游击队攻占了职田镇后,杨虎城急调驻守旬邑县城的警备团三营与彬县、旬邑、淳化三县的民团武装约1000余人,向职田镇开来。在警备团三营有个共产党员叫李明轩,是七连的连长,谢子长曾派马佩勋与他接上关系。李明轩连夜派人赶到职田镇送信,将警备团三营和民团攻打职田镇的作战部署全部告诉了游击队。

谢子长得到情报后,决定抓住战机,将计就计,当即命令部队连夜撤出职田镇。红军在镇子以东20里的阳坡头埋设伏兵,筹划与李明轩里应外合歼敌。

2月15日拂晓,警备团三营和三县民团在职田镇扑空后,即向阳坡头方向进发。路上李明轩故意牵着马徒步行走。士兵们问李明轩:“连长,你怎么自己牵着马走?”

李明轩故意吓唬士兵们说：“打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牵着马，走过来方便得多。”

警备团三营和民团行至阳坡头，进入游击队的包围圈，谢子长一声令下，顿时四处枪声大作。谢子长身先士卒，从隐蔽的土坎中跃出，带领战士如同猛虎下山，冲入敌群，并集中火力杀伤了先头主力。

李明轩见时机已到，跳上马鞍转马头就朝后跑，并高声大喊：“红军来了，快跑！”

警备团三营后边跟着的民团队伍见李明轩带着连队后撤，不知游击队的虚实，顿时军心大乱，不战自溃，争相逃命。谢子长急令游击队跟踪追击，一直追杀到旬邑城下，战斗才结束。

阳坡头一战，警备团三营的两个连及一个民团几乎被陕甘游击队全歼，游击队活捉了一个连长和一个排长，毙俘300余人，缴枪300余支。这一战斗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士气，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迅速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阳坡头战斗结束后，陕甘游击队返回到职田镇召开了庆捷大会。会后，杨重远给俘虏士兵做宣传工作，问士兵们谁愿意留下当红军，但他们因深受国民党对红军“妖魔化”的谣言蛊惑，都支支吾吾不说话。指挥部在面对第一次俘虏到这么多士兵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李杰夫认为，俘虏中查出一个连长和一个排长，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对当军官的人应一律杀掉，把普通士兵放走；谢子长等认为，连长和排长都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杀一两个也可以，但怕产生不好的效果，从俘虏士兵的情绪看，他们对红军还不了解，不如把他们全部送回去，可为红军优待俘虏做最好的宣传。经一番争论，李杰夫见大家是多数意见，也未再争辩下去。

当天夜里，先打发走被俘的连长和排长后，游击队派杨重远为代表，把被俘的士兵伤员送到旬邑城下。警备团长张汉民（共产党员，后为杨虎城部旅长）派出城外的接收代表正好是七连长李明轩。李明轩装出不认识杨重远的样子，特意向杨重远献上团长张汉民赠送的两箱“礼物”。

返回的路上，大家把“礼物”打开一看：全是子弹！有人愣着神说：“张汉民真是死心眼，给咱们这么多子弹，还让咱们再打他！”他们哪里知道张汉民就是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自己人呢。

两打山河镇

1932年2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离开职田镇,沿着旬邑县马栏方向行进,南下到清水塬、土桥塬一带。这时,杨虎城部的两个团受命由淳化进至旬邑,准备同游击队再次交锋。

谢子长避敌锋芒,率部队转到耀县照金镇。在照金镇驻守着一个民团,未有任何防备,红军就将这一民团武装全部俘虏。

2月21日,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镇,开到了位于耀县境内交通要道的柳林香山寺。

香山寺是陕西有名的庙宇,从沟底一直修筑到山巅,地势十分险要,还拥有大量土地、牲畜、牛羊,囤积大批粮食、金银财物,并有不少大烟土。寺庙里的和尚处处欺骗、坑害老百姓,不但长年出租土地,雇工剥削群众,而且当群众到香山寺烧香时,每次还要交两块银洋。谢子长通过交涉,将寺庙里许多粮食分给了附近的贫苦饥民。

在香山寺,谢子长主持召开了陕甘游击队队委会议。在会上,谢子长总结了这段时间的作战和发动群众工作的经验,讨论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并结合实际情况,首次提出了在陕甘交界的照金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当部队离开香山寺时,在阳坡头战斗中负伤的胡廷俊因腿部伤口恶化,谢子长决定通过党组织将其送到西安去治疗。胡廷俊先到西安,后又转上海治疗,并锯掉一条腿,但他仍利用所装的假腿,把文件装在假腿里,为党积极工作,后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逮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3月,陕甘游击队离开香山寺,东跨桥山,在宜君县包围了焦家坪民团。当游击队的骑兵冲进焦家坪时,30多个团丁还在睡觉,光着身子全部被俘虏。

接着,游击队消灭了瑶曲镇民团,并先后击溃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及国民党一个营的两次进攻。之后,部队经桥山进入中部县的上畛子,然后返回正宁县三嘉塬一带的寺村塬、湫头塬。

这时,陕军与甘军在陇东发生混战。谢子长根据中共陕西省委作出的《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议》和《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决定乘此有利时机,以寺村塬为中心开辟游击区域,武装农民,扩大红军影响,实行土地革